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筆璨五采，室藏五財

——在中山大學余光中特藏室啓用典禮的講話

□黃維樑

高雄市中山大學圖書館近開「余光中特藏室」，於2011年3月24日舉行落成啓用典禮，主禮者有年逾八旬的余光中教授、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教授、中大圖資處長楊昌彪教授、政治大學陳芳明教授，和我。我應邀在典禮中致辭。我把當日講話略加修飾而成本文。「余光中特藏室」布置清雅，藏品珍貴；中大圖書館籌設的「中山大學余光中數位文學館」亦於此時建構完成，上網可尋得。我講話中提到的余光中特藏室，其五種財富、五種用途等說法，應該也適用於其他作家（或作家群）的特藏室或文學館。台灣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城市都設有大大小小的文學館；香港作家呼籲政府在西九建香港文學館，但主政者置若罔聞，可嘆。

我非常高興來到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參加這個余光中特藏室落成啓用典禮。我今天早上從宜蘭經台北來到這裡。在北部，我「聽聽那冷雨」；這裡高雄的陽光真好，我們都在陽光中，在余光中。

清代的翁方綱（1733–1818）是個杜甫迷，16歲開始讀杜甫的詩，50年後寫出了《翁批杜詩》這本書；之後這位粉絲繼續讀其杜詩。我則為余光中的長期讀者，數十年來，我的文學思維經常離不開余光中。說到目前台北仍在舉行的「花卉博覽會」，我馬上想起余光中的近作《花國之旅》：花博中有「色彩合法暴動」，卻又是「唯美主義的大殿堂」，那裡「琪花瑤草將我們寵成了仙人」；花之國萬卉爭艷，花之多，連極愛花極喜戴花的屈原「也無法逐一點名」。電視新聞出現利比亞等地的戰火和炮聲，我就想起余光中的《如果遠方有戰爭》。這詩說戰爭中，「榴彈在宣揚真理」，「戰車狠狠犁過春泥」。北非動亂，殺戮在進行；日本大地震海嘯後，人們則奮力搶救生命。欲其死與保其生，對立並存。這個世界就如葉慈（William B. Yeats）的詩《再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說的「分崩離析，中心不存」，而余光中翻譯過這首著名的詩。

回到陽光中、余光中的高雄，我馬上想起他的《控訴一支煙囪》、《讓春天從高雄出發》：「讓木棉花的火把／用越野賽跑的速度／一路向北方傳達／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他也寫過《台東》一詩，大大讚美了台東，希望高雄人不要嫉妒。）與高雄及其鄰近地方有關的還有「余光中詩園」（裡面有《母雞日》《五行無阻》等20首），還有《墾丁十九首》，這些詩很多人都讀過，都欣賞。

余光中是博大型詩人，其詩情感豐沛深刻，技藝精湛。他也是傑出的散文家、批評家、翻譯家，還是位出色的編輯。我

說過，他手握五色之筆：用紫色筆來寫詩，用金色筆來寫散文，用黑色筆來寫評論，用紅色筆來編輯文學作品，用藍色筆來翻譯。數十年來作品量多質優，影響深遠；其詩風文采，構成二十世紀中華文學史璀璨的篇頁。我之外，兩岸三地以至全球其他華人社區，還有很多人都是他的知音、粉絲。余先生成就的傑出，為大家所公認。很多年前，梁實秋先生已說：「余光中右手寫詩右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成就高，余先生是中華的文豪，更不愧是「高雄」——高雄的文雄。今日出席典禮的陳芳明教授也說過，余光中「有點石成金之筆」，說他的詩在台灣、大陸以至世界已「創造新的典範」。誠然，說余先生有多傑出就多傑出。四百年前，班·姜生（Ben Jonson）極力稱頌其前輩莎士比亞，說人和詩神妙思（Muse）怎樣褒揚他，都不會過份（「I confess thy writings to be such / As neither man nor Muse can praise too much」）。對詩翁余光中，也可作如是觀。

余先生在香港的中大教了十年書，在高雄的中大則快26年了。在中山大學圖書館闢室特藏余氏作品和相關資料，順理成章，還有別的大學、別的地方更適合嗎？在離五福路不遠的這個特藏室，珍藏手握五采筆的余氏文學財富，我認為應有五項：一為余氏與中山大學有關的物品、資料，包括印上余氏詩句的茶杯、雨傘等。二為余氏與高雄有關的物品、資料，包括書法家楚戈寫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這幾乎是高雄的市歌、市詩了。三為余氏與各地有關的物品、資料：兩岸三地以至更遠，包括台北《廈門街的巷子》、香港《春來半島》、泉州《鄉愁》、新疆《策勒的來信》、紐約《登樓賦》等相關文物。四為世界各地余學論著種種資料，包括我最近編好的這冊《余光中作品評論第四集》。當然最大的一筆文學財富，就是余氏的作品，包括數十本余氏著譯書籍及手稿。

余光中特藏室應該有五個用途：一是讓中大師生多認識這鎮校之寶。二是讓訪客來中山大學參觀，多了一個亮點、景點。三是讓余氏的粉絲瀏覽書、稿、圖片、電子影音等等，還可讓參觀者到附近的中大書店購買紀念品。四是讓余氏的知音細覽各種文本等資料。五是讓余學學者在此做研究。

五項財富、五個用途，五途無阻，像余先生詩說的「五行無阻」。這個室可擴大，發展成為「余光中文學館」。別的大學和地方，如台灣的台大、師大、政大，香港的中大，大陸的南大，泉州的永春縣，可能會仿效，或闢室或建館，向這位大師致敬。五采、五富、五途，像余詩《五行無阻》說的順暢無阻，「在壯麗的光中」。

王賡在美國西點軍校以優異成績畢業，在140個同學中，他是第14名。同班同學有個艾森豪威爾，日後成為二戰歐洲盟軍統帥，美國第34屆總統。

王賡回國，任職北洋政府陸軍部，他在1920年和陸小曼結婚時，為陸軍上校，不久晉升為陸軍少將。陸小曼曾評論王賡：「身為武夫，而又帶着濃重人文脾氣。」婚後，兩人是不太融洽的。小曼浪漫，王賡比較拘謹，下班回家，抱着原文版德文書不放，小曼又未生育，不到數年時間，留英的作秀詩人徐志摩追求小曼，於是鬧出紅杏出牆的緋聞，離婚收場。王賡十七歲赴美留學，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歷史、政治，他成績優異，是被美國西點軍校找去約談，接受陸軍教育的。這位守規矩、講民主的才子，既不逢迎拍馬，又不長袖善舞，在官場和情場，注定他是失敗者。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當時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因為該部隊缺乏高素質的炮手，所以宋子文把王賡借來，讓他負責向日軍開炮。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王賡指揮的炮兵總是打不中目標，為此王賡寢食難安。於是，王賡騎了一輛破舊腳踏車，想到美國駐滬領事館去找西點軍校同學研究一下。剛騎到白渡橋，腳踏車壞了，王賡心想拐彎走一段路就到，索性把車子放在路邊，走路。王賡心中急，進門也不看招牌，等他衝進去發現了日本兵，大吃一驚，轉身就跑。其實美國領事館已經

搬走，倒霉的是王賡並不知道。

王賡慌不擇路，鑽進附近一家飯店（現為浦江飯店）的廚房，慇求外國廚師讓他躲一下，那人因為害怕，不肯幫他，於是，被日本兵逮捕。

王賡心中暗想，隨身還帶了機密文件，絕對不能落入日軍之手。他大聲說：「這裡是租界，你們不能隨便抓人，我們應該先到捕房辦一手續，你們有槍，我是跑不了的。」虹口巡捕房就在附近，一切如王賡所願，捕房將他的公文包扣下，讓日本人帶走了他。

不料，王賡因泄露軍事機密文件，蔣介石將王賡拘捕囚於南京監獄。後來，我方派代表和日本舉行談判，5月5日簽訂「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停戰，中國不得在上海、崑山、蘇州一帶駐軍，而日本可以在許多地區駐軍。大抵王賡在牢獄蹲了三個多月，就復職了。

當時，政府高層對於留德、日兩國軍事人才比較重視，出身西點軍校的王賡，人少力薄，又不善逢迎，他被當局冷漠是必然的事。

王賡和陸小曼結婚，是一大敗筆。他恢復自由後，上海有家報紙還說王賡將攜前妻、寡婦陸小曼赴德留學。這真是中國新聞史上的烏龍事件。

王賡是江蘇無錫人，1895年5月15日生。抗戰初期，他擔任軍方工兵署昆明辦事處處長。因患心臟病、腎臟病，有位炊事兵專門為他做素菜淡飯。王賡



王賡像

平易近人，對待部屬如同兄弟，他們都喊他「王頭」。後來，王賡娶了一個比他小三十歲的廣東姑娘，他看書，她的哄小孩，兩人沒有共同的語言。一九四二年四月，王賡隨熊式輝率領的軍事代表團，赴美，途經埃及開羅，犯病，只得住進醫院。不久病逝。終年四十八歲。遺體葬於開羅市郊英軍公墓。他那位廣東籍妻子，後來改嫁，將兒子送給王賡弟王序撫養。

嘉道理農場紀念亭
(陳德錦攝)

在農莊裡觀自然之音

□陳德錦

大自然攝影家最為人欽佩的，是能在一堆凌亂無序的景物中設定框架，準確而靈敏地捕捉所見所感，在光影游移之際、按下快門的一剎那，能夠超越俗的眼光，表現出景物獨特的精神。看了艾思滔（Edward Stokes）的影集，心有所動，趁春日未盡、路程不長，坐了半小時巴士，到嘉道理農場一遊，目的不在於置身畫框或鏡頭中，而在體會紅塵中一片清景之趣。

這次重遊，距上次到訪已三十年。記得那時園內花木葱蘚，開着淡黃、粉紅、雪白花朵的木芙蓉，漫山遍野的杜鵑，十分奪目。農場在大帽山北麓，依山而建，利用有限土地建造了不少梯田，農舍裡養殖了大白豬，雞聲處處可聞。據說創辦人賀理士當年在高山上發現一棵橘樹，而萌開辦農莊的主意。氣候潮濕的高地本來不宜種植柑橘，這株挺立的橘樹，說明了這一方水土並不如想像中之澆薄。當年的農場本為扶助農民謀生，但近年都市擴張，香港的農產無法自給自足，扶助農民的計劃已無法貫徹。因此契機，農場近年致力保育植物品種，成為一個環保莊園，既保存了當年實驗農場的規模，也具有大自然野趣，故在名字後加上「暨植物園」。

隨一衆遊人乘坐園內的穿梭巴士，繞着彎弯曲曲的山路，到達最高的山巔，在紀念亭向東面望去，是大帽山的主峰，向西望去，一層薄薄的煙霞縹繞處，是錦田的市集。在紀念亭到觀音山的一段路上，繁花吐蕊，這裡一叢那裡一束，由薜荔到藍花藤，花期月月不同，品種之多，形貌之奇麗，堪稱香港所僅見。要培植罕有的植物，關鍵在於讓其抵抗不利的環境。蘭花要供養於溫室，不能讓它暴露於酷寒或暑氣之中。農場利用冷藏法，珍貴的種子可以延續命脈。認為樹木是粗生粗長、不必保護，這看法不夠科學。從百年前的洋紫荊，到最近的「香港海棠」，沒有大自然這萬物的搖籃，以及一群持之以恆的保育者，是很難被發現的。

在人人爭相為其拍照的大白花旁邊，有另一個豬圈，一頭灰毛野豬在跑來跑去。這野豬不是要覓食，彷彿是給人驚嚇，無處躲藏。園內的動物護理中心還有鸚鵡、麻鷺、領角鶲、赤鵠等動物，觀賞價值更大；野豬經常破壞農作物，竟然獲得收留，目的正為年輕一代復修香港的生態。曾經是麻鷺家園的昂船洲，已與貨櫃碼頭連成一體；赤鵠不慎墜入水坑，也是舊日新聞的話題。舉目無鳥、林獸絕跡，我們的環境已經扭曲到不容野生動物落腳了。

四月進園，錯過梅花吐蕊的時節，卻喜見枇杷和柿子能落腳本土。「這大帽山麓的一角，是香港郊野的過去還是將來？」青少年時代，我們走進嘉道理農場，把這裡當做另一個郊野（卻不愛家畜的臭味），從沒想到今天它營造了值得深思細察的生態。這裡可以自駕遊，愛遠足的父母不怕汗流浹背，推着嬰孩車，也可以進園呼吸新鮮空氣。農場的世俗化沒有失卻它的理念，它加入「觀音」這中國元素也相當恰切。閉目掩眼，不可能感覺到人與自然會有親近，也不可能對那無處落腳的鷹隼、隱遁無聞的奇花異卉產生憐惜之情。走過一道種滿幾十種蕨類的幽徑，拍了幾張照片，我想起門前已無青草的一塊荒地。

2011.5.6



繁花吐艷 (陳德錦攝)

素食的年代

(英)伊·范斯坦 紳士忱譯

不過，塔巴逐漸成為與普寧一家摩擦的根源。1927年9月1日，她向病中的希列伊科報告說：「圖申（塔巴的別名——作者按）令我十分痛苦。我自己再次治好了他……請給我寄來委託書，應該付給普寧圖申的生活費了。我一文不名……關於水管工盧克尼茨基給你寫過了嗎？」阿赫瑪托娃和盧克尼茨基負起修理希列伊科寓所的責任，因而水管工是需要的，正如上一封信所說明的，因為走廊的水龍頭被扳掉，房間沒水。1928年8月她寫道：

塔巴很不幸。她患了癌症。今天動手術。整個夏天我都在為她忙活，但她變得更壞。

現時她在醫院裡已一個星期，他們說需動手術。費用——每天一盧布，手術免費。我已經付了藥費。

她的健康情況再度惡化。7月12日阿赫瑪托娃寫道，「眼下我病了足足一個月。過幾天我要到醫院裡去檢查身體。」不過，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列夫的到來，攪亂了家庭的平衡。

1928年，十六歲的列夫離開了祖母在別熱茨克的家，來到封坦卡大樓與母親和普寧一家同住。

他改變了家庭的平衡，這個平衡本來就繩得緊緊的。列夫需要在列寧格勒找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因為他發現自己成了被當局深所懷疑的人物，當局害怕它的犧牲品的子女懷有復仇的思想。不過，經普寧的弟弟亞歷山大的幫助，列夫在亞歷山大、普寧任校長的中學獲得一個學位。他打算進入列寧格勒大學，修讀中亞歷史。他父親很喜歡他的這個選擇。

列夫雖然是個孩子，卻已經備受爭議，他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在1921年5月。後者成為他生命中的英雄和傳奇。古米廖夫只到過特維爾省二到三次，但列夫深深地記得這些訪問，特別是他鼓勵自己研讀歷史。古米廖夫送給列夫一冊哥特人征服意大利的書，祖母認為這冊書太艱深，但孩子對此十分珍愛：「我讀不懂它，但我到現在仍記得書中的每一句。」有趣的是他以回憶父親的鼓勵開始，在拉夫羅夫的《命運與思想》一書中談到自己的一生。提到父親在教育上主動關心僅一次——接下來他把這與阿赫瑪托娃對自己選擇的專業採不贊成態度加以對比。列夫記得古米廖夫繪畫過赫拉克勒斯的功

績，以及畫上的文字。雖然畫作今已不存，但列夫仍可將父親教他的詩一字不落地背下來。他在普寧那非常規的家庭中生活得很不容易。這種不快不僅是心理的。普寧的寓所根本不能為不速之客提供住處——列夫只好在走廊的皮箱子上睡覺。他揣測普寧擔心被判極刑的詩人的兒子會給家庭帶來危險。

列夫不喜歡普寧，原因並不在於後者對自己不加隱瞞的厭惡。在其晚年認識列夫的謝爾蓋·拉夫羅夫聲稱：「我想是古米廖夫認為普寧的書告發了他的父親。」拉夫羅夫援引了刊於《公社的藝術》的譴責文字。這篇文章寫於古米廖夫被處極刑三年前，以其迎合的腔調和無條件贊同古米廖夫從俄國文學世界除名的行徑而發人生厭。

以何等的努力，僅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一年前，我們才擺脫了灰暗、柔弱和淫蕩的資產階級美學的長期壓迫。我承認，在這整整一年裡，部分因為幾個「批評家」和「詩人」（例如古米廖夫）停止了寫作，或者最少停止刊出和朗誦作品，而令我私心竊喜。

正如上文所說，普寧和尼古拉·古米廖夫於1921年8月在第彼得特監獄曾短暫會晤。在他入住普寧的寓所時，年輕的列夫不可能知道這點。不論這是什麼原因，列夫談到自己和普寧的關係時與阿赫瑪托娃和埃瑪·格爾什泰因的記敘如出一轍，應該記住，他同樣刻薄地對待母親，而且往往很不公平。似乎普寧的占有慾使得他難以寬容地對待列夫

。雖然列夫是一個乖巧的孩子，學習用功，然而很明顯，他是阿赫瑪托娃注意力的競爭者，無論普寧何等的多變，他還是想把這種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阿赫瑪托娃經常痛苦地回憶，普寧對列夫的來到深為不滿，而他的女兒和外孫女則對她的記述表示異議。普寧性好辯論。伊琳娜·普寧娜，在列夫踏入家門時，她還是一個七歲的孩子，非常熱切地談到父親的善良。她堅持後者總是善待列夫，還指出正是他，在列夫的父親被宣告為罪人之際，在自己弟弟的學校裡替列夫找到一個學位，這個舉措的本身就需要勇氣。她進一步聲稱，列夫和普寧的關係很好，並描寫了令人愉快的燈盞、書架和列夫所欣賞的他的走廊寢室的其他生活用品。伊琳娜的女兒安娜·卡明斯卡婭也活畫出一幅外祖父的圖像來與阿赫瑪托娃抗衡，然而應該說，她寫的普寧與列夫在三十年代的關係，所引以為據的材料只能得自其母：

列夫對母親以及對繼父的怨忿——也許為以後的經歷所加劇，——已被他所有的朋友加以證實：「……應該說，我住在普寧的寓所覺得難受，因為我不得不在走廊的箱子上睡覺。走廊沒有供暖，很冷。媽媽只在教法文時才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但由於她缺乏當老師的技巧，我讀來很困難，只是在進大學後才正式學到法文。」

(《阿赫瑪托娃傳第八章》，二)